

古代經濟

中国文化系列丛书
悠悠中华之韵

林山 主编



北方婦女兒童出版社

古代经济

中国文化系列丛书
悠悠中华之韵

林山主编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长春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古代经济 / 林山主编. — 长春 :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2019.1
(中国文化系列丛书. 悠悠中华之韵)
ISBN 978-7-5585-0688-8

I . ①古… II . ①林… III . ①中国经济史—古代
IV . ①F12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311446 号

GUDAI JINGJI
古代经济

出版人 刘刚
策划 师晓晖
责任编辑 刘莉
封面设计 五车科技
开本 165mm×230mm 1/16
印张 14
字数 202 千字
印刷 永清县晔盛亚胶印有限公司
版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出 版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发 行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 编: 130021
电 话 编辑部: 0431-86037970
发 行 科: 0431-85640624

定 价 28.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生而勃发，古时经济	1
1. 经济大同时代	1
2. 商：上古经济的繁荣	2
3. 春秋战国经济思想	5
4. 曲折的秦汉经济	7
5. 开发江南经济	9
6. 民族经济，交流发展	12
7. 明清的官私工业	14
第二章 经济衰落，近代之殇	17
1. 历经千年的漕运	17
2. 漕运线上的城市——天津	21
3. 漕运线上，江南名城	23
4. 前夜的危机	25
5. 西方冲击了中国经济	28
6. 走出危机	30
第三章 民之根本——农业	33
1. 农业的起源	33
2. 夏商西周的农业	36

3. 春秋战国的农业	39
4. 汉朝的农业	43
5. 三国时期的农业	46
第四章 农业，走向商品化	51
1. 隋唐的农业	51
2. 宋朝：精耕细作的形成	54
3. 用做商品的农产品	56
4. 明朝时期的农业	58
5. 商品性农业的发展	60
第五章 考工记：繁荣的手工业	63
1. 手工业的历程	63
2. 金属的冶炼	65
3. 古代纺织业——先秦时期	68
4. 古代纺织业——汉唐	70
5. 宋元明清的纺织	73
6. 棉纺织，异军突起	75
第六章 手工业的星河灿烂	78
1. 享誉中外的陶瓷业	78
2. 多彩的造纸业	81
3. 印刷术，改变了世界	84
4. 化工：来自炼丹术	87
5. 制盐与酿酒业	89
6. 领先世界的造船业	92

第七章 四方交流，互通有无——商业	95
1. 商业的初级阶段	95
2. 汉唐商业的面貌	98
3. 长安的繁荣景象	101
4. 繁荣的宋朝商业	104
5. 成熟的元朝商业	107
6. 明清时代的商品经济	109
7. 活跃繁荣的城乡商贸	111
第八章 海内来往，天涯交易	115
1. 开辟时代——汉唐	115
2. 繁盛而复杂——宋元	119
3. 曲折多变——明清	121
4. 丝绸之路	126
5. 千年茶马古道	128
6. 茶马古道形成历史	131
7. 茶马古道带来繁荣	135
第九章 金钱游戏，古代金融	138
1. 古代的钱币	138
2. 古代金银货币	140
3. 金融业的雏形——钱庄	143
4. 金融业的发展——账局	147
5. 金融业臻于成熟——票号	150
第十章 中外金融交锋	154

1. 晋商办钱庄	154
2. 传统金融，受到冲击	156
3. 开在中国的外国银行	159
4. 中国人的银行	161
第十一章 在寺院发源——典当业	165
1. 当铺史话	165
2. 宋金元的法律管理	167
3. 典当与宋元经济、生活	170
4. 黄金时代——明清	172
5. 清朝的官当	174
6. 清朝官当经营	176
7. “官当”的作用与弊端	180
第十二章 千古悠悠话商人	183
1. 新兴的自由阶层——商人	183
2. 大商贾与小商人	184
3. 独特的商人文化	187
4. 商人圣祖——范蠡	189
5. 齐商巨贾吕不韦	191
6. 商人的沉浮命运	193
第十三章 纵横天下，商帮传奇	197
1. 新型商人与商帮	197
2. 晋商：富甲华夏	200
3. 徽商：腰缠万贯	202

4. 山东商帮闯关东	204
5. 辉煌的陕西商帮	207
6. 后起之秀，宁波商帮	209
7. 福建商帮：海商与海盗	212
8. 广东商帮传奇	214



第一章 生而勃发，古时经济

悠悠中华之韵

古代经济

1. 经济大同时代

《礼记》是儒家的经典著作之一。《礼记》曾经这样描绘过上古社会：天下为公，大家推举能干、公正的人为部落领袖，人们并没有明确的家庭和私有观念。年纪大的长者和幼小未成年孩子由大家一起抚养，有劳动力的人尽自己力量为公众做事。财富不属于个人，所以，没有盗贼，也没有为自己利益玩弄计谋的人，连主人出门在外时，家里的门户也不必关闭。这样的社会叫大同。后来，社会风气变了，人们有了明确的家庭观念，也有了自己的私有财产，大家都尽力使自己家庭变得更富有。原来的部落首领变成世袭制，不再是大家推举公平、能干的人来担任。建起了城池，制定了君臣、上下、礼仪制度，划分了各自的田地。这样的社会叫小康。

《礼记》虽然是后人对上古社会的追述，对于大同社会和小康社会的描写，却基本上反映了母系氏族社会和父系氏族社会的真实情况。从大同到小康的社会发展，正是原始社会经济形态发展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经济关系发生变化的表现。

原始人群阶段，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那时候，人类与自然斗争的能力比较低下。从中石器时代开始，母系氏族社会进入了发展时期，促使这种形态发展的，则是新石器时代社会经济的繁荣。首先，妇女是农业、畜牧业、制陶业和纺织业的主要发明者，她们的劳动成果为人类提供了较采集和渔猎远为丰富的衣食之源。此外，妇女还承担着烹煮食物、生育子女等重要的事务，男子通常还停留在渔猎的生产领域，并没有突出的作为。妇女于是在新石器





时代前期到中期社会经济生活中占主导地位。属于仰韶文化时期的陕西临潼姜寨遗址，表现出母系氏族社会中妇女待遇较高的典型特征，即妇女的随葬品明显多于男性。

进入新石器时代晚期，即龙山文化时期，随着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的发展，男子逐渐进入了由妇女承担的传统劳动领域。如农业的发展，犁耕的出现，增加了劳动强度，使男子在生产中得以发挥更大的作用，最后成为农业劳动的主力。畜牧业也是如此。在手工业方面，最主要的生产部门制陶业采用了新的技术，特别是采用快速陶轮，烧制陶器的窑室也得到进一步改进，容量大，劳动强度高，妇女于是逐渐退出了从事制陶业的劳动。

社会经济发展改变了传统的男女社会分工，男子成了经济生产的中坚。在母系氏族社会里，子女世系按女方计算，男子无子女可言。当男女在生产中所处地位变化后，渐渐出现了按男性世系将财产传给自己亲生儿子，动摇了母系氏族社会的基础，最终导致了家庭和私有观念的出现。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劳动所获的产品，除了维持生活基本需求外，还略有剩余。当家庭形成后，剩余产品便成了家庭的私有财产。于是，在父系氏族社会里，出现了财富占有的不平等。某些墓葬的葬品多寡极为悬殊，大汶口墓群的随葬品中，有的不仅使用木质葬具，还有大量的陶器、骨器、玉器、象牙，个别墓葬中随葬猪头多达 14 个，显示了墓主生前拥有财产十分丰富。

2. 商：上古经济的繁荣

公元前 16 世纪，原先居住在黄河下游地区的东方部落商族，在经历了几代人的发展努力之后，一举推翻了夏王朝的统治，建立了地域更为辽阔的商朝。

商朝是中国上古社会的鼎盛时期，作为社会经济基础的农业和手工业，开创了中国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新局面，尤其是青铜器的





制作工艺，成为商代文明的突出象征。在当时，无论是农业、纺织业、青铜制造业，还是畜牧业，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创下了我国奴隶社会经济的一个高峰。

此外，商朝主要的手工业还包括制骨业和玉器加工业等。在当时，由于金属工具尚不多见，骨器制造业仍是一种古老而又重要的手工业。除了常用工具如骨锥、蚌刀、蚌镰等农具外，商朝墓葬中出土的骨器还显示了令人称绝的工艺水平，如象牙杯通体刻有精细的图纹，并镶嵌着绿松石片。与骨器制作相仿，玉器的加工工艺水平也较夏朝有了明显的进步，如栩栩如生的玉雕动物，各种玉器表面的浮雕图案，线条流畅，生动传神，有强烈的艺术效果。

随着社会分工的深入，手工业中制陶、纺织、竹木器、玉器加工等行业的专业化趋势也越来越明显，许多手工业产品逐渐商品化，奠定了商业产生的基础。到了商朝，不但交换物资的种类和范围扩大了，交换地区也显著增加了，组织产品交换已成为社会生活中经常性的活动，商业正式出现了。交通运输与商业同步发展，顺着商王朝开辟的驿路，由奴隶主贵族操纵或委托的中介人以及手下的小臣，驱使着大批奴隶，往来于内地和海滨、这个城市到那个城市，贩运着各地的土特产。也有一些平民，将自己捕获的鱼或编织的草席、草鞋之类拿到市上叫卖。当然，这些商业活动仅占当时商品交易的极小部分，主要的交换活动是在奴隶主之间进行的。而且，交换主要是为满足奴隶主贵族的消费需要，如西方的玉石、东方的珠贝、南方的铜锡矿石、北方的筋角等。

在甲骨文和铜器铭文中常常出现“贝”和“朋”字，贝指海贝，朋则是贝的计算单位，一朋五贝。商朝人非常重视贝，故又称为货宝，是被用于赏赐的东西，也具有价值尺度的职能。此外，甲骨文中如买（買）、贮、贷等字，都从贝字。这些现象说明，贝已经具备货币的功能，开始脱离了装饰的功用，成为市场流通的手段。然而由于贝的数量有限，流通上受到很大限制，商代晚期虽然也出现了铜贝，即金属货币。总的来讲，货币制度还处在商品经济萌芽状态的初级阶段，并不稳定。



城市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发展的，商品交换和交通运输的发展，对城市形成，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商朝统治的广阔区域，陆陆续续出现了一些我国历史上的早期城市，如商、殷、毫（bó）、蕃等。

这些城市既是商王或各属国的王公贵族居住的地方，又是各种手工业作坊的所在地和交换各种商品的场所。我们从考古遗址的情况来看，自从掌握了轮流休耕的农业生产方法之后，城市便比较稳定地固定下来，因而也随之繁荣起来了。在世界城市发展史上，商朝的城市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商朝早期或中晚期的城市，都是用夯打的方法来筑城墙，墙体厚达十余米。城中还建有贵族居住的宫城，宫城内有正殿、附殿、庭院、廊庑，也都建筑在夯土台基上。城外，挖有又宽又深的护城壕。城内特别是宫城里有许多工程浩大的排水系统，包括石木结构的或完全用石块垒砌起来的暗沟。

河南安阳殷墟是商代后期盘庚至商纣王统治时期的王都所在地。经过几代人的建设经营，城市里殷商建筑鳞次栉比，规模也最大。除了规模宏大的王宫遗址外，还有许多中小奴隶主及平民的居住遗址，有大面积的铸铜作坊和制骨作坊，城里还有水井、道路、排水管等遗迹，总面积在24平方公里以上。殷墟有一些大型商王陵墓，从随葬的大量精美艺术品来看，显示了青铜时代光辉灿烂的文化成果，而成百上千的奴隶殉杀坑，则又使人们看到，奴隶制经济时代，奴隶所处的地位是多么低下。

从商朝各地发现的城市遗址来看，尽管相距数千里，不同地域的城市，在建筑布局、城市基本设施等方面却显示出较大的趋同性，这表明了以商王朝为核心的文化共同体已经在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形成。

随着城市的建设与发展，城市经济在补充和协调农业、手工业和畜牧业经济方面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对促进整个社会的生产和经济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商业逐渐成为城市经济的主要支柱。因此，城市的发展，可以看作是商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



3. 春秋战国经济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经济形态的演变，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上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人们对经济活动的各种看法，在后来中国封建社会的不同阶段，都能寻觅到其历史演变的痕迹。

春秋前中期管仲关于发展工商业来增加国家收入的思想，反映了素有重视工商业传统的齐国的现实。管仲出身没落贵族，有过经商的历史，后来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个霸主。在管仲经济思想中，最著名的是四民分业的理论。他把人的职业分为士、农、工、商四业，并且主张四种职业世袭化，也就是让士的儿子继续为士，农的儿子永远务农，等等。而且，同一行的人在居住上也聚集在一起，理由是彼此易于交流生产经验，提高技术水平。管仲的思想明显带有从统治者便于管理出发的保守性，但却反映了他对当时社会随着经济发展出现新的分工现象的敏锐性，尤其是他高度概括了四种不同性质社会分工的特点，以至在封建社会经济形态未发生根本变化的2000年间，士农工商的分类，一直沿用到了近代，这不能不说这是管仲独到的地方。

孔子是儒家学说的创始人，政治上比较趋于保守，他也主张正常地进行社会生产。他的学生子贡经商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孔子并不掩饰自己欣赏的态度。孔子主张统治者轻税、从俭、节用等，虽然从形式上看似乎在为日薄西山的周代礼制唱挽歌，又含有符合处于变革时代劳动者和新兴地主的需要。在合乎他的“道”的标准的前提下，他不排除对富贵的追求，也主张按照社会的不同分工，各尽其职，以备将来国家之用。孔子的经济思想，带有浓厚的伦理道德学说的色彩，对后世儒家经济思想影响很大。

春秋末年的范蠡既是成功的政治家，又是成功的巨商。他在经济管理方面的思想，有很多启人深思的见解。比如，范蠡认为，以谷物为例，如果价格太低，伤害农民的利益，农民就不会有生产的



积极性，农田便会荒废；谷物价格太高，商人又受不了，不愿经营粮食交易，经济便会发生困难。如果把谷物调节在一个适当的价格水平上，农民和商人都能有利可图，关卡和市场也保证政府的收入，范蠡把这称为“农末俱利”。用今天的语言来说，范蠡明确提出了商品价格与生产和流通的关系，以及如何通过调控手段，使各经济部门能够协调发展。在2000多年前提出这样的经济思想，不愧是治国和理财兼长的杰出人物。

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的战争日益激烈，富国强兵成为各国政治家最急切的目的，而商业的发展，不同程度上会对自然经济产生影响，从而战国时农工商并重的经济思想很快转向重农抑商。在这方面代表法家思想的政治家李悝和商鞅是两位典型的人物。

李悝将农业看作是国家财富的唯一源泉，强调国家督促农民种田，以争取好收成的重要性。同时，创“平籴”法，由国家在丰收年景时收购粮食，在欠收年景再平价售出，稳定价格，保证生产的积极性。但他过于强调农业的重要性，认为手工业和工商业的发展会损害农业，使人民饥寒，令国家贫困。

商鞅在秦国推行变法时，不但抑制商业，而且限制和打击一切非农业行业，甚至到了禁止商人卖粮、不许人民自由迁徙、不许人民享受文化娱乐的程度。这在追求富国强兵的过程中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却是违背经济发展规律的。这也是战国时期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重农抑商的经济思想发展到极端的一个典型。

在春秋战国的思想家中，荀子的经济思想比较完整，他主张重农、富国、富民，可以看作是先秦儒家从重农工商到重农轻商的经济思想转变的代表人物。

荀子与商鞅等人观点不同，主张通过富民来富国，富民的途径主要是让民众通过农业生产来致富。国家应该施行减轻农民税收、徭役负担，减少商人的数量，保证农民有充分的时间和精力来进行农业生产。民富之后，国富才有基础。荀子虽然主张在数量上抑制商人，却又不完全否认商业和贸易的职能，而是希望工商业的发展被限制在一个合适的度里。所以，他也建议修治道路，建旅舍，以



便行商往来，并建议关市不必征税，以保证商业贸易能正常进行。他甚至还建议发展对外贸易，引进四方的珍奇货物，供本国人享用，这与他提倡合理的欲望应得以满足的理论是相应的。荀子重农抑商的经济思想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

4. 曲折的秦汉经济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结束了诸侯纷争的战国时代，建立起第一个空前统一的封建王朝——秦。

为了巩固统一的秦帝国，秦始皇采取了一系列经济措施，来推动经济的发展。这些措施，包括统一货币和度量衡，健全中央集权政府的财政管理，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加强地区间联系的基本建设工程。秦朝负责管理中央财政的机构是大内和少内。大内长官又称治粟内史，负责田租的收入，主要为管理国家谷物的收发和贮存。少内掌管税收，如山林川泽、盐铁以及人口税等。地方设郡、县两级行政制度，由郡守将每年户口、赋税、钱谷收入如实上报，接受考核。中央对地方财政的控制管理，强化了中央集权统治的基础。

在这个时期，秦朝的农业、手工制造业、商业等各方面的经济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皇家的陵墓中掩藏着无数的珍奇宝货，官府的仓库里充溢着谷物，星散在全国各地的工商业城市呈现出繁华的景象。这一切都是秦始皇完成统一大业后，运用专制主义的力量，在短短的十余年时间里聚合而成的。然而，也正是由于专制主义超负荷地榨取人民的劳动，无休止的征发徭役，无止境地修建大型土木工程，残酷的刑法，严重地摧残了社会经济。使得秦代的社会经济，在显示其繁盛的同时，暴露出深刻的危机，旋即陷于崩溃，连同秦王朝一起，毁于农民起义的烈焰中。

经过秦末长达六年之久的社会动乱，汉高祖刘邦在长安建立起西汉王朝时，面临的是社会经济凋敝的景象。农民大量流离失所，不得耕作，甚至自卖为奴。昔日繁华的城市一片萧条，投机商乘机



哄抬物价，米一石值万钱，马一匹卖到百金。皇帝的车子要配上四匹毛色相似的马都很困难，宰相出门也只好坐起牛车来了。于是汉朝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恢复经济。

随着农业、商业、手工制造业的繁荣发展，除了都城长安以外，洛阳也是一个重要的工商业城市。其地理位置南连梁楚，东接齐鲁，是交通枢纽之地。邯郸、临淄、江陵、吴、成都等城市早在战国时便成为所在经济区的中心，著名的临淄，除了鱼、盐、漆等土特产外，尤其以精美的纺织品居于全国之冠，因而也是畅销各地的商品。广东番禺则是海外贸易的大都会，珠玑、齿（象牙）革（犀牛皮）、葛布，以及中原不易见到的热带水果如荔枝之类，都极受人们欢迎。

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土地兼并的现象也不断加剧，同时，日益贫困的农民自卖为奴婢的情况也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为了应付出现的社会经济危机，统治阶级试图以限田限奴婢的方法来缓和尖锐的社会矛盾，但无济于事。之后，外戚王莽先以辅政的身份摄政，进而在居摄三年（8年），自立为帝，改国号为新。

王莽先后以度名田和推行五均六筦的措施，试图解决西汉末年尖锐的社会矛盾。然而，土地兼并的情况并没有缓和，所谓在长安、洛阳、邯郸、临淄等主要工商业城市实行市场管理的五均，以及由国家来直接掌握盐、铁、酒、铸钱等事业的六筦，也都以失败告终。与此同时，王莽又频频实行币制改易，所铸钱币在民间毫无信用，反而导致许多人家的破产。当这些违反经济运行规律的措施导致社会出现更大混乱时，又以残酷的收孥相坐的法律来进行镇压，混乱程度愈演愈烈。西汉末年，当发生灾荒时，米价暴涨至5000钱甚至1万钱1石，1斤黄金只能换5升豆子，统治阶级已经到了无法再维持下来的程度，终于崩溃在绿林、赤眉农民起义中。

汉光武帝建立东汉经济以后，虽然随着社会的稳定，东汉社会各方面的经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豪强地主田庄经济也同时发展壮大起来。这种经济是与大土地占有制发展同步形成的，由若干家庭农业和手工业结合，成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体系，不但能满足基本生活需要，还有油坊、染坊、盐工坊等手工业作坊。但



在这种田庄经济内部，贫富分化非常严重，农民的处境日益恶化。由于封建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建立在自耕农经济为主体的基础之上，所以，豪强地主田庄经济势力的膨胀，便与封建国家经济制度形成冲突，最终，引起封建国家经济的严重危机。从经济学原理来看，东汉社会在经历了恢复和发展阶段之后，出现后期社会经济的滑坡乃至再度陷入崩溃，根本原因正在于此。

5. 开发江南经济

公元 317 年，晋宗室司马睿在建康（今江苏南京）立国，史称东晋。公元 420 年，刘裕代晋，改国号宋，之后，又经历了齐、梁、陈三个政权的更迭，直到公元 589 年被隋军灭亡。这段历史被史学家命名为南北朝时期。

此前，西汉和东汉末年，北方人民曾两度避乱南下，对江南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西晋末到十六国时期，北方地区的混乱，持续时间远远超过汉末，因而北方流民的南下规模，也超过以往。据估计，南下江淮以南者，大约接近 100 万人。正是流民的南下，为南方的生产带来了生力军，使江南经济的面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东晋南朝的历代统治者都比较重视农业，经常颁诏令要求地方官对农民善加劝导，做到地无遗利，耕田养蚕，各尽其力。同时，地方官在推广新的农具和新的耕作技术时，也比较注意实际效果。东晋以前，江南仍有相当部分地区是采用火耕水耨 (nòu) 的方法进行粗放、原始的经营，此后，基本上普及了铁犁和牛耕。为了提醒和鼓励人们对耕牛的重视，南朝宋孝武帝和明帝在每年春耕之前，都下诏令禁止杀牛。

生产技术的进步，水利灌溉工程的恢复和兴修，粮食单位面积产量也提高了，较好的稻田亩产量平均十斛左右，较东汉时平均三斛增加许多，因而不但公家储备有大量粮食，士庶地主之家通常也

